



《学点历史》丛书

辛亥革命前夜的 一场大论战

章开沅

K257/1

《学点历史》丛书

辛亥革命前夜的 一场大论战

章开沅

人民出版社

«学点历史» 丛书
辛亥革命前夜的一场大论战
章开沅

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春书店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75印张 41,000字
1975年6月第1版 197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1001·285 定价 0.17元

出版说明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重视学习历史，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明天。”学习历史，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要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现实斗争服务，为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服务。《学点历史》丛书，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而出版的一套历史普及读物，根据当前学习的需要，将分册出版。

毛主席语录

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

凡是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

目 录

一、两个营垒，两条路线	3
二、革命派与保皇派的大论战	21
三、尊法反儒与尊儒反法的斗争	41
四、“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67

毛主席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指出：“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2日）

二十世纪初年，特别是从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七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展开一场激烈论战。论战的焦点是：究竟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推翻帝国主义的走狗清王朝？这是一场政治斗争，也是一场思想斗争。革命派不仅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方案打击了改良派君主立宪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借用法家的思想武器批判了康有为之流的尊孔倒退卖国思潮，为辛亥革命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派不可能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路线，更不可能彻底批判孔孟之道，这又成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契机。

透过这场论战可以看到，农民起义风暴怎样又一

次把尊法反儒与尊儒反法两种思潮的斗争推上政治舞台，中外反动派怎样利用孔孟之道阻挡革命潮流，新兴资产阶级怎样进行尊法反儒的斗争，以及二十世纪初年这两种思潮的斗争具有什么新的内容和新的特点，等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认真总结这次论战的经验教训，对于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是有意义的。

一、两个营垒，两条路线

二十世纪初年的旧中国，风雨如磐，惊雷滚滚。

十九世纪以帝国主义八国侵略联军血腥镇压义和团而宣告结束。一九〇一年，清政府在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上签字。“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它不仅承诺了四亿五千万两所谓“庚子赔款”，而且允许帝国主义在北京和其他军事要地驻扎军队。爱国有罪，救亡问刑，中国人民被剥夺了抵御外侮的正当权利。祖国的大好河山，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为一块块的“势力范围”；东北的大片领土，仍然处在老沙皇兽蹄蹂躏之下。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一次又一次血案，一桩又一桩滔天罪行，白山黑水是我们民族深重灾难的历史见证。

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民怨沸腾，民变蜂起。整个社会在剧烈动荡，政治营垒在迅速改组。在新的世纪到来的时候，祖国的前途怎样？民族的命运怎样？一系列生死攸关的问题，严峻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不兴必亡，不亡必兴，固我中国之前途也。……呜呼，今日已二十世纪矣，我同胞之国民，其将何以自处也？”一篇名叫《二十世纪之中国》的政论文章，就是这样尖锐地提出了问题。各个阶级、阶层、政党，都用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眼光，回顾十九世纪，展望二十世纪，对这个问题作出不同的答案。

地主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清政府，已经完全成为“洋人的朝廷”，进一步对外屈辱投降，对内残酷镇压。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租赋债息，层层加码。这条帝国主义的忠顺走狗，已经激起各个被压迫阶级、阶层的强烈憎恨。它和广大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成为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的焦点。

农民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王朝的主力军。就在《辛丑条约》签订的第二年，景廷宾在直隶广宗一带高举“扫清灭洋”大旗，聚众两万多人，继续坚持斗争。从一九〇二年到一九〇五年，四川、两湖、两广、陕西、吉林等省人民，也纷纷高呼“灭清剿洋”等战斗口号，奋勇打击中外反动派。群众斗争的锋芒，愈来愈集中地指向帝国主义的走狗清王朝。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广西，以农民为主体的会党反清起义迅速遍及全省。广东、云贵、江西、浙江、山东等省人民，也纷纷“结盟拜

会”、“竖旗起事”。这些起义规模越来越大，往往一夜之间聚众数千，有的甚至发展到数万人，在州县之间以至各省之间交相蔓延，有力地削弱和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

新兴的中国工人阶级，当时虽然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但在迅速成长过程中已经与农民一起成为民族民主革命的主要动力。一九〇五年以后，上海、汉口等各大中城市的工人，不仅踊跃参加抵制美货运动，愤怒抗议美国政府虐待华工，而且多次举行数千人的罢工斗争，坚决反抗外国租界和资本家的残酷压榨。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把群众的反抗怒火引进城市，更为直接地打击着中外反动统治的中心地区。

在十分激烈的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中间，在劳动人民反抗斗争的强力推动下，资产阶级发生了明显的政治分化。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曾经主要代表过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和要求，领导过戊戌维新运动。这个阶层大多由封建官僚、洋行买办、大地主、大商人转化而成，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具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因此妥协性更为严重。他们极端害怕革命风暴将会冲击自己的大量财产和既有的社会地位，因此幻想通过温和的改良来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并

且抵制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他们被席卷全国的义和团反帝风暴吓破了胆，疯狂攻击，恶毒咒骂，堕落成为人民革命极为危险的敌人。

早在一八九九年，康有为已经在加拿大正式建立保皇会，并且在维多利亚、温哥华等地大事为实际上已被废黜的光绪皇帝祝寿。“上帝与龄怜下土，小臣泣拜倒蒿莱。”他们祈求老天爷保佑这个傀儡皇帝多活几年，幻想有朝一日光绪能够掌握实权，他们一伙就可以成为“功勋重臣”，挤进最高统治者的行列。二十世纪初年，这一小撮保皇小丑主要活动在海外，与帝国主义殖民当局、国内的大买办、大官僚串通一气，到处宣传君主立宪主义的反动政治路线，千方百计地破坏革命党人的活动。在经济上，他们也是到处招摇撞骗，诈骗华侨商人的钱财，大搞地皮买卖等投机牟利活动。据不完全统计，保皇会当时已经成为拥有墨西哥银行及轮船公司、纽约琼彩楼及杂碎馆、香港振华实业公司及华益公司、上海广智书局、广西天平山锡矿等大小企业，资本达一千五百万元以上的经济集团了。从各方面都可以看出，康有为一伙实际上已经堕落成为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的鹰犬。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主要反映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和要求。这个社会力量大多是手工

作坊主、工场主、中小商人、钱庄主等演变的中小资本家，主要分布在缫丝、轧棉、轧油、碾米、印刷等比较简易小型的加工工业和其他次要的工业部门。他们的经济力量薄弱，社会地位较低，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系较少，而受外资排挤与官府勒索较多，因此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可能不同程度地参加革命。

一八九四年，在甲午中日战争引起的严重民族危机中，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第二年又在香港设立兴中会。早期的兴中会员，约有一半是商业和农牧业的中小资本家，其余是学生、各种小资产阶级和会党活动分子，也有少部分工人。他们初步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决心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兴中会一建立就着手进行武装斗争，一八九五年曾经策划在广州起义，一九〇〇年在惠州举行起义。这两次起义虽然先后失败了，但是比较鲜明地表现出兴中会革命的政治路线的特点。

兴中会与保皇会显然是互相对立的两个营垒，代表着截然不同的两条路线。但是，革命派识破康、梁一伙的保皇真面目，却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

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了改良主义的道路走不通，这个重要的历史经验驱使更多的爱国知识分子走上革

命道路，但是他们对康有为、梁启超转向反动的政治立场这一点则缺乏认识。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梁逃亡到日本，仍然打着“爱国志士”的招牌到处活动。革命派对他们抱有幻想，曾经一再寻求合作，以谋共同推翻清政府。康有为是公开拒绝，反复强调：“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今上（指光绪）的。”梁启超却狡猾得多，他在康有为离开日本以后，立刻伪装同情革命。甚至表示两派合并后，愿意推孙中山为会长，自己当副会长。实际上这不过是为了骗取革命派的信任，利用革命派在华侨和留学生中的影响，首先为保皇派在海外谋求立足点，然后再逐步排挤革命派，扩大保皇派的地盘。

梁启超的反革命两面派伎俩，模糊了兴中会与保皇会之间的政治界线，使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损害。

一八九九年年底，梁启超奉康有为之命，到檀香山建立保皇分会。檀香山是兴中会的发源地，保皇派在当地华侨中本来毫无工作基础。梁启超出发前，虚伪透顶地向革命派发誓：“合作到底，至死不渝”，骗取了孙中山的信任。他一到檀香山就拿着孙中山的介绍信到处招摇撞骗，大挖兴中会的墙脚。他对华侨说：“保皇会与兴中会，革命的目标彼此是一致的。不过，革命需要掩护，兴中会标揭颠覆满清的旗帜，不能公开活动，尤其不易回国活动，如用保皇会的名义则进行可以

便利。”很多兴中会会员被他骗进保皇会，甚至连孙中山的哥哥也上了圈套。檀香山的兴中会组织被破坏得七零八落。

兴中会在日本横滨华侨中的分会，也是这样趋于瓦解的。横滨本来是兴中会仅次于檀香山的策源地，可是很快就被梁启超一伙用花言巧语骗去一大半会员，连原来的革命据点大同学校也被保皇派侵占。梁启超还在横滨创办《清议报》，宣传君主立宪，反对民主革命。从此，这里成为保皇派对抗革命派的反动据点。

同时，保皇派还在“合作”的幌子下，极力破坏革命派在国内的群众基础。一八九九年春夏之间，孙中山曾派人回国联络两湖一带会党势力。十一月，长江流域会党首领云集香港，与兴中会负责人及广东、香港三合会首领举行会议，决定兴中会、三合会、哥老会联合组成一个革命大团体，并且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革命派想利用义和团运动在华北迅速发展的有利时机，组织力量在华南和长江流域举行武装起义。保皇派立即打出“殊途同归”的幌子，再一次骗取了革命派的信任。实际上，他们不过是利用兴中会在长江中下游已经联络好的会党势力搞军事投机，秘密策动“武力勤王”，妄想把光绪皇帝重新扶上台。结果，兴中会在长江流域辛苦经营多年的群众基础，又遭到严重摧残。

康有为、梁启超一伙，凭借在戊戌变法时期捞到的一点政治资本，披着爱国维新的外衣，利用革命派在政治上还比较幼稚，曾经在一段时间欺骗了不少群众。保皇会仅在美洲华侨中间就设立了十一个总部、八十六个支会，“美国、加拿大、檀香山、墨西哥、古巴各地无一处不根深蒂固”。同时在日本、香港、澳门等地也陆续成立了分会，并且先后在广州、檀香山、旧金山、香港、横滨、新加坡、温哥华等地出版报刊，极力诋毁革命党人。其中，梁启超于一九〇二年在横滨出版的《新民丛报》（前身是《清议报》），标榜什么“持论务极和平，不偏于一党派”，装作一副“公正”模样，影响极为恶劣，是革命派最危险的敌人。

这些活生生的事实，一次又一次深刻地教育了革命派。孙中山等终于认识到过去“专心致力”于武装起义，放松了革命舆论工作，“遂使保皇纵横如此，亦咎有不能自辞也。”他们决心从政治上、思想上与保皇派划清界线，到各处扫除“保皇毒焰”。

从一九〇一年到一九〇四年，革命派同改良派初步交锋，逐步区别了两派的政治分野，两个营垒、两条路线之间的对立，日益明显地展现在人们眼前。

早在一九〇〇年，孙中山已经义正辞严地谴责梁启超在檀香山招摇撞骗的无耻行径。但是，梁启超继

续玩弄“合作”花招，大谈什么“必当合而不当分，既欲合，则必多舍其私见，同折衷于公义”。他标榜孔孟的中庸之道，大谈折中调和，把革命派的原则立场污蔑为“私见”，而把无原则的混合美化为“公义”。他还胡说什么在两派之间“不必故划鸿沟”，妄想又一次向革命派灌迷魂汤。然而，孙中山看清了梁启超的真面目，决心同这些口蜜腹剑的假朋友公开宣告决裂。一九〇〇年四月，在孙中山的支持下，革命派特地在保皇派盘踞的横滨出版《开智录》，专门驳斥《清议报》的反动谬论，宣传革命思想，争取被保皇会蒙蔽的群众。

震撼世界的义和团反帝风暴，有力地推动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蓬勃发展，鼓舞着革命派向清政府及其走狗保皇派进行斗争。章太炎首先与改良主义道路决裂，清算自己过去“与尊清者游”（指与康、梁混在一起）的错误，举起了尊法反儒的旗帜，抨击尊儒反法思潮，鼓吹民主革命。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中间，革命意识更是迅速增长，保皇派本身也发生分化。一九〇一年六月，原来曾经追随过康、梁的秦力山等终于醒悟过来，创办《国民报》月刊，宣传反清革命，揭露保皇派罪行，成为重要的革命喉舌。形势对革命派越来越有利，正如孙中山以后回忆的那样：义和团运动以前，革命派被孔孟之徒们污蔑为“乱臣逆子，大逆不道，咒骂之声，